

对日关系的艰难求索

冯昭奎

【内容提要】“对日新思维”具有丰富的内涵，其关键主张就是“不宜让‘历史问题’影响中日关系的全局”，但并非主张中国单方面放弃或搁置历史问题，而是主张“双管齐下”（既要认真解决历史问题，又要积极发展中日关系）地处理对日关系。当前中日关系发展的现状可以说与这种“思维”是完全符合的。尽管小泉一再参拜靖国神社给中日政治关系的发展制造了严重障碍，我们仍然坚信中日关系的发展是不以小泉这样的个别领导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时代潮流，是客观的必然的历史趋势。

【关键词】对日关系；新思维；外交

【作者简介】冯昭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北京 邮编：100007）

【中图分类号】D8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9550(2004)05-0026-06

诚如中日领导人一再表明的那样：当前中日关系总的来说是好的。但由于双方在历史问题上的分歧，频频引发政治摩擦，导致首脑互访中断，造成了很大负面影响。为了突破历史问题这个中日关系的“瓶颈”或“死结”，中日学者展开了积极思考，提出了各种建议。自马立诚在 2002 年底发表《对日关系新思维》一文以来，“对日关系新思维”（以下简称“对日新思维”）成为中日间的一个热门话题。

尽管“对日新思维”遇到阻力之大，超出人们的想象，但从中日关系现状看，“对日新思维”却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

一 “对日新思维”产生的来龙去脉

“对日新思维”的关键主张就是“不宜让‘历史问题’影响中日关系的全局”。尽管“对日新思维”的提法是由马立诚首先提出的，然而未采用这个提法的、实质上的“对日新思维”早已产生，其形成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 1997 年到 1999 年初。著名国际问题专家何方在 1997 年 5 月 11 日《环球

时报》发表题为《我们能同日本友好下去吗？》的文章中明确指出：“应实事求是地评估日本，日本并没有复活军国主义，不宜让‘历史问题’影响中日关系的全局。” 尽管何方的观点在当时大众媒体上可说是“孤掌难鸣”，但在一些国际问题学术杂志上也出现了一些持有类似观点的文章。何文主张“根据形势的变化，在对日关系的看法和做法上做一些调整”，这个提法体现了中国对日方针中“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统一，应是对目前流行的“对日新思维”的一个准确注释。

第二阶段：从1999年春到2002年11月。这期间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界围绕对日关系问题展开了空前热烈的议论，一系列的研讨会、连篇累牍的报告、文章，都在“对日新思维”的形成过程中留下了自己的足迹。上述何方文章的观点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赞同，例如杨伯江发表文章主张对历史问题要从外交的全局来考虑，……防止与整体利益发生冲突。

第三阶段：从2002年12月至今。马立诚在《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6期上发表了《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一文，时殷弘又在该杂志2003年第2期上发表了《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一文。这两篇文章提出“日本道歉问题已经解决”，主张“在一段时期搁置历史问题”，在中日舆论界掀起轩然大波。

从2003年第三季度至今，《战略与管理》《世界经济与政治》《世界知识》《现代国际关系》等刊物竞相发表讨论“对日新思维”的文章，有的文章概括了“对日新思维”的5项原则和10个特色，并提出了“既要认真解决历史问题，又要积极发展中日关系，而且后者更重要，更带有全局性”的“双管齐下”处理对日关系的主张。有的文章虽未使用“对日新思维”提法，但使用了“对日关系的战略性新思考”、“思维观念的调整”等提法，各种提法的共同点就是主张“根据世界形势的变化，从战略的高度使对日外交思想‘与时俱进’，有所创新”。

据不完全统计，在2003年一年间围绕“对日新思维”的论辩文章已有数百篇发表于国内外各种出版物上，在中日出版的专著至少有5种。“对日新思维”分别被中日权威传媒人士评选为‘2003年中日（日中）关系十大新闻’之一，其在两国学界、舆论界掀起的波澜，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选）：《何方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86-194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选）：《何方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86页。

杨伯江：《从理性思考探索跨世纪中日关系的发展》，载《现代国际关系》，1999年第9期，第1-6页。

冯昭奎：《论对日关系新思维》，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4期，第1-17页；其简写版发表于[日]《中央公论》，2003年第12期，第206-214页。

远远没有退潮。”进入2004年，有关“对日新思维”的基本观点日益渗透到大量有关对日关系的文章中。在中共十六大以来逐渐形成、确立的科学发展观与“和平崛起论”所提供的新的理论视野下，有关“对日新思维”的研究与为了中国和平发展的“外交新思维”研究以及有关民族主义的讨论日益形成“三位一体”的关系。

二 “对日新思维”面临的困境

当前，“对日新思维”面临的困境主要有三方面：

第一，由于中日媒体和网络对个别人文章中的某些观点大肆炒作，使人们对“对日新思维”形成一种先入为主的偏见，以为它就是主张“不要再提历史问题”。在中国国内，对这种主张持强烈反感的人们似乎没有心思去辨别“对日新思维”的不同“版本”，区分其主流意见与非主流意见，大有全盘否定“对日新思维”之势。而日本某些媒体则将它们更喜欢的、主张中国单方面不要再提历史问题的观点等同于“对日新思维”，导致对中国很多学者提出的“对日新思维”乃至中国政府对日政策的某些误解。部分日本媒体对“对日新思维”的炒作反过来又使国内一些人认为日本在有意利用“新思维”为自己对华外交的失策开脱责任，批评“对日新思维”是在“替日本人说话”。

无巧不成书。正当人们围绕“对日新思维”展开激烈争辩之际，2003年下半年，又出现了齐齐哈尔八四事件（侵华日军遗弃化学毒气弹泄漏事件）、日本游客珠海买春事件、西北大学日本留学生辱华事件等，激起了一浪接一浪的反日情绪高潮。其中八四事件本身就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从而以事实否定了那种认为“历史问题已解决或可搁置”的观点。而这种脱离现实的观点又被一些人有意或无意地强加于所有主张“对日新思维”的学者身上，致使“对日新思维”论者在缺乏冷静、理性的“口水战”中陷入“有口难辩”的窘境。

第二，小泉在历史问题上表现得反而更强硬。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中日关系发展是一个“互动”过程，是需要双方都来努力的事业。中国需要对日新思维，日本在对华关系上也应克服各种心理的和政治的障碍，同样需要“对中新思维”；中国需要“与时俱进”，日本也不应该“与时不进”；中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同样需要日本以善相报，不要误读中方诚意；只有当中日双方都做到“与邻为善，以邻为伴”，中日关系才能真

刘柠：《“对日新思维”流变一周年》，载《南风窗》，2004年第4期，第18页。

参见：《胡锦涛没说过“中日关系要有新思维”——访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记者林治波》，载《中文导报》，2004年3月4日。

正达到“为善为伴”的境界。

尽管日本一些媒体、学者发出了日本也应有“对中新思维”的呼声，然而小泉在历史问题上表现得反而更强硬，一再参拜靖国神社，对日本国内不少政治家以及韩国政府提出的“建造其他追悼设施以取代靖国神社”的主张以及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提出的“将甲级战犯牌位移出靖国神社”的主张，小泉也完全置之不顾。小泉这种做法主要是出于自身信念和争取部分特定选民的狭隘动机，尽管这种举动不等于他不想搞好日中关系，但确实给两国关系造成了麻烦。由于中国的对外政策很透明，日本也摸得很透，既然中国在对日外交上总是表现出顾全大局的姿态，小泉也就不难估计到中国对他一再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不至于做出太强烈的反应，更不至于采取打贸易战的办法来报复，中国为了保持社会稳定也不希望中日摩擦激化而导致民族情绪高涨的局面。小泉自以为他的强硬态度在外交和国内政治上“得了分”，但这至多是“战术上的聪明”，绝非是“战略上的聪明”，诚如中曾根康弘所言：“日本硬得像一根铅笔芯，但这根铅笔芯太狭窄。”

有的作者认为，日本对中国学者的“对日新思维”的反应“已经陷‘新思维’论者于不义之中，可谓‘一点面子也不给’。……使‘新思维’论者陷入茫然、失语乃至愤怒。”事实表明，近年来中国的“新思维外交”几乎从所有对象国那里都获得了肯定评价和积极响应，惟独在对日外交方面仍困难重重。

第三，中日国内日益升温的厌恶对方国家的情绪化倾向，也使“新思维”论者感受到很大压力。小泉一再参拜靖国神社的“非理性举动”以及中日间的其他摩擦对中国国内的反日情绪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互联网上甚至出现了“中日世世代代永远为敌”的声音。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客观冷静、实事求是地讨论中日关系问题的观点在互联网及一些场合竟被扣上“汉奸”、“卖国贼”的罪名。在日方，日益蔓延的所谓“厌中”情绪也对客观冷静、实事求是地讨论日中关系问题的部分学者形成压力。两国部分民众相互反感的情绪化倾向增强，也增大了中国政府对日推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外交方针、力求改善中日关系的政策难度。

三 从中日关系现状看“对日新思维”

如果以“不要再提历史问题”的“新思维”版本看，中日关系发展现状可以说与这种“思

[新加坡]《海峡时报》，2003年11月14日。

刘柠：“对日新思维”流变一周年》，载《南风窗》，2004年第4期，第18页。

维”是完全背离的；如果以“不宜让‘历史问题’影响中日关系全局”、主张“双管齐下”地处理对日关系的“新思维”版本看，当前中日关系发展现状可以说与这种“思维”是完全符合的。

尽管围绕小泉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中日政治关系几乎陷入僵局，但综合两国在经济、政治、安全、文化等领域的关系来看，不能不承认两国关系仍在继续发展，所谓“双管齐下”模式也体现在中日关系中政治与经贸、国家与地方、政府与政党等各个领域。

第一，政治关系与经贸关系“双管齐下”。尽管中日关系出现了“政冷经热”局面，中国政府在推动两国政治关系方面仍做了很大努力。2003 年 9 月吴邦国委员长对日本进行了成功的访问；因为参拜问题而被冻结的中日军事交流得以重新启动，两国部长级会晤也大都得到恢复；中国免除日本游客的短期旅行签证；中国警务外交官进驻日本协助调查旅日华人犯罪案件等等，都体现了中国对日外交的积极、务实姿态。从日方说，在 2003 年发生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期间，日本向中国提供的援助最多；“最近以来，日本国内对中国发展的认识出现积极变化，与小泉首相所持的中国的发展对日本不是威胁而是机遇的认识有很大关系”；日本政府 2003 年底就台海局势所做的积极表态也受到中国政府的赞赏。

在经贸关系方面虽存在一些问题，但两国经贸关系不可谓不“热”：2003 年中日贸易总额达 1335.8 亿美元，比上年净增 316.9 亿美元，在一年间跃升 300 亿美元台阶，真可谓“史无前例”（在 20 世纪 90 年代前半期中日贸易曾出现过在一年间两国贸易额跃升“百亿美元”台阶的盛况），而且目前中日贸易额的实际数字比统计数字更大，因为不断增加的日资企业在中国国内的销售额未进入统计，这块“中国国内的中日贸易”也在迅速扩大。

与“经济热”相随，两国间人员交往和文化交流也在升温。2003 年中日人员往来达 368 万。在日本 11 万外国留学生中，中国留学生占近七成；日本国内出现了“学习汉语热”，年轻人到中国学习的人数也在增加。在文化交流方面，日本动画片为中国青少年所喜爱，而中国电影和音乐（如“女子十二乐坊”）也风靡日本。人们日益认识到努力推动文化交流能有效地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实事求是地改进两国媒体对中日关系及对方国家的报道，对改善两国人民的相互感情和改善两国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第二，国家关系与地方关系“双管齐下”。尽管出现了中日首脑互访中断的局面，但两国在地方层次上的“高层往来”更趋活跃。目前，中国除青海、贵州、西藏以外，其他省或自治区都有城市与日本相应县市结为友好城市，共计 220 对。两国地方官员及经济界的相互

引自新华社东京 3 月 15 日电：“胡锦涛致信小泉”。

交流更加活跃和务实,扩展到经贸、科技、文教、医学、市政建设等广泛领域。

“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对于我国来说不仅是某一地区的问题,而是意味着中国进入新一轮重化学工业化的全国性问题。2003年中国东北地区各省、市的地方领导纷纷前往日本开展招商活动,日本经济界人士也频繁来到东北地区考察。中日地理接近非常适合于两国在重化学工业、也就是所谓“重厚长大”产业领域开展合作。中国推进西部大开发和振兴环渤海经济区依然是中日合作的重要增长点。最近有人提议在迎接北京奥运会期间,加强北京与东京的交流。

第三,双边合作与多边合作“双管齐下”。尽管首脑互访中断,但两国首脑在多边外交场合的会见并未减少,两国在多边外交方面的合作反而有所扩大,显示出“多边高于双边”的外交政策取向。中国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两次主办有关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加强了与日本的协调与合作。中国积极推动中日韩合作,三国领导人在2003年10月发表了《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中日在“10+3”(东盟+中日韩)框架内的合作也有所加强,其合作内容已经从经济领域扩展到安全领域。

第四,政府交流与政党交流“双管齐下”。在政府间交流继续开展的同时,两国政党和政治家之间的交流趋于活跃。首届中日执政党交流协商会将于今年秋季召开。中国共产党与日本各在野党之间的交流也相当活跃,加强中日年轻政治家或国会议员之间的交流活动日益受到重视。

第五,外交政策与国内教育“双管齐下”。为了贯彻服务于中国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政府日益重视对公众舆论加以正确引导,帮助公众理解中国的外交政策,包括外交部长在互联网上与网民聊天,外交部副部长向公众做国际形势报告等。诚如有的学者指出:“政策制定者掌握全面情况,会思考采取某种政策行动的理由、力量对比及其引起的后果;而形成公众舆论的人们从媒体上了解的情况通常是不充分的,他们不需要过多思考政策的可行性、后果和理由就表达自己的观点。所以,公众总是希望政府在外交和军事上更强硬、更有所作为。……另外,你很难判断某一个观点就是公众的观点,……也许存在着‘沉默的大多数’。”“社会上也有一种心态,遇到事情反应过于激烈,这可能对外交部门和中央在处理事情时产生负面影响。”

王缉思、谢淑丽:《公众舆论与外交决策》,载《环球时报》,2004年1月16日。另外,有研究表明:“中国的网民总数为7950万人,这只占中国人口的大约6-7%,考虑到网民的构成与非网民明显不同,如果一定要说网络舆论代表民意的话,至多也只是代表了网民的想法。”“其次,即使在网民中,经常在网上发言的人与不发言的人也有很大的不同。……许多时候,网络上的‘大多数人’持有某种看法的时候,有可能并不一定真的就是网络上大多数人的想法。”

吴建民在“两会”中接受记者采访,引自《解读中国外交新思维》,载《瞭望》,2004年第11期。

中国有关部门和学者还大力提倡开展正确的、科学的爱国主义教育，呼吁“要超越狭隘民族情绪和培养国际责任意识”，主张“理性地看待民族差异，理性地化解民族矛盾，以此作为我们不可回避的文明责任”，主张“大国公民要有大国气度”，防止针对某一民族的极端反应，主张“塑造健康的国民心态”，以利于我们制定更加理性的外交和经济政策等等。

上述一系列“双管齐下”的状况表明，中日并未因历史问题而影响两国关系全局，对日新思维已经体现在中国灵活的对日外交之中。有的作者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倒像是被命名为“新思维”的对日灵活外交影响和炮制了“新思维”理论似的。

从本质上说，鉴于当今中日关系进入了相互矛盾与共同利益（不仅仅是经济利益）都趋于增大的状态，因此采取既认真处理相互矛盾又努力争取共同利益的“双管齐下”思维模式完全符合中日关系的客观实际。

四 “对日新思维”具有生命力的基本依据

中日关系正面临新的发展机遇，这是“对日新思维”具有生命力的基本依据。^①

第一，中日关系发展是不以个别领导人意志为转移的时代潮流，是客观的必然的历史趋势，个别领导人的意志可能使两国政治关系受挫于一时，却不可能改变两国关系发展的根本趋势。

当今经济全球化时代潮流的实质就是在全球范围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全球范围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努力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将本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放到全球范围进行，成为世界各国发展先进生产力的明智选择。

从产业结构看，中日是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从国家基本情况看又是同处东亚的两个不同类型的大国，两国经济具有极强的、持久的互补性。通过中日经贸关系的链接，有力推进两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成为发展先进生产力的根本要求。中日经贸关系的实质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政治、外交上维护和促进中日经贸关系发展，最根本意义也就在于适应发展先进生产力的需要。

历史事实证明，一切与生产力发展“对着干”的政治、政策都不可能持久，最终是行不通的。有鉴于此，尽管目前中日政治关系在小泉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遇到了一个难以解开的

① 韩少功：《超越“民族”》，载《环球时报》，2004年1月2日。

陆建德：《大国公民要有大国气度》，载《环球时报》，2004年1月30日。

钱克锦：《塑造健康的国民心态》，载《环球时报》，2004年2月6日。

刘柠：《“对日新思维”流变一周年》，载《南风窗》，2004年第4期，第18页。

“死结”，为两国关系大局着想的人们似乎仍未找到解开“死结”的办法，但可以相信这个问题从根本上不可能阻挡中日平等互利的合作关系的发展，有关中日关系的政治、政策终将跟上经济和生产发展的现实。正如日本的媒体所指出，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两国经贸关系持续发展，日本将无法忽视中国的存在，这种潮流不会停留在经济领域，日本外交将走向“重视中国”的历史性转折点，将由“追随美国”转为“重视中国”。

第二，鉴于中日关系发展是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使然，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和客观趋势，是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崇高事业，因此完全可以相信随着两国人民“眼见为实”，日益感受到中日关系发展给两国带来的巨大利益，重视相互关系的政策必将在两国赢得越来越多的民众支持和越来越广泛的群众基础。

但是，近年来中日政治关系的冷淡确实导致了两国国内针对对方的反感情绪升温，而当情绪化倾向膨胀到一定程度、激化到一个“临界点”时，难免导致“行动化”，可能影响到两国开展正常贸易和中国吸引日资的环境和气氛。中日在经济上既已形成了如此紧密的关系，就不难想象如果出现两国关系全面倒退局面，将会给两国经济和人民利益带来多大负面影响。中日政府对“政治冷”给两国经贸关系可能造成的危害应有足够估计，特别是日方需清醒地认识到由于历史问题等所导致的两国关系敏感性和脆弱性，及时采取措施消除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负面影响。

为了中日的共同利益，需要努力使两国人民了解中日关系对两国发展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显然不仅仅限于经济领域。特别是日方需要将“中国的和平发展不仅不构成什么‘威胁’，反而带动了日本经济的复苏”的真实情况告诉广大国民（进入2004年日本媒体在这方面的报道和评论显著增多），我们要对有可能危害两国关系的事态努力做到事先防范和及时处理，避免出现中日经贸关系发展受到政治关系发展滞后的束缚和损害的局面；我们还要争取在一二年内使两国贸易规模进一步攀升至1500亿美元的水平。

在中方，尽管中国对日政策不能不考虑民族感情，但其根本依据显然是中国的战略目标和“国益”（包括国家利益、国民利益和国际利益）而不是一部分民众的情绪，中国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需要为本国、本地区发展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

情绪化、非理性化的东西终究不可能支配两国关系发展，不可能改变两国关系持续发展

[日]石乡冈健：《日本外交将走向“重视中国”的历史性转折点》，载[日]《每日新闻》，2004年2月16日。

国之利益(National Interest)不是指狭隘的国家利益，而是包含了国际利益、国民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广泛概念。引自[日]天儿慧：《21世纪中日关系与日本的展望》，载《战略与管理》，2004年第1期，第77页。

的潮流。中国十分注意争取广大民众理解并支持政府的基于国家战略利益的、科学而理性的外交方针，同时注意防止出现狭隘民族主义情绪，因为狭隘民族主义不符合中国的爱国主义理论，而且具有既破坏对外开放又影响国内稳定的双重负面作用。

第三，在安全领域，中国政府提出的“新安全观”与日本政府提出的“人类安全保障”不存在根本对立。中国强调“和平崛起”意味着中国将力求通过维护地区稳定来实现其发展目标，而一个稳定的地区也是日本谋求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与此同时，一个稳定的东亚和为之努力的东亚地区安全合作也符合（至少不违背）美国的要求，因为美国没有足够力量来按照自身意志构筑一个全球安全结构，一个不排斥美国的东亚安全地区化有助于减少其“霸权的成本”。总之，中日共同推动东亚安全的多边合作既符合两国利益也具有现实可行性。

近年来，日本为了甩掉战败国帽子、加快走向“普通国家”而力图修改宪法第九条，促使自卫队向正式军队转化；为了配合美国全球战略和美国所主导的国际安全行动而力图通过立法允许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为了保护其分布于全球的经济利益而利用各种机会出兵海外；为了确保能源进口“海上通道”安全和缓解其狭窄岛国的地理局限性而扩张海空军力量并全面展开大陆架（包括与邻国有争议的岛屿）调查等，这些新动向引起了周边国家的很大关注。尽管日本是否修宪纯属其内政，但联系到小泉表示他对靖国神社内供奉的、被东京国际法庭处决的战犯“没有抵触感”等，人们为日本一部分政治势力企图突破“和平宪法”的努力感到担忧也是有道理的。

其实，日本所关注的多数安全问题都具有“双重选择性”，即很多问题既可能导致发生与邻国的矛盾和冲突，也可能通过加强与邻国的合作和协调来解决。比如，对有争议岛屿既可能走与邻国相互争夺之路，也可能与邻国共同开发；对海上通道既可能走与邻国相互戒备乃至冲突之路，也可能与邻国共同保卫；为了开拓新的能源供应地，日本既可能与邻国形成激烈争夺，也可能在开拓新的能源供应地以及能源节约等方面与邻国加强合作。目前中国每创造 1 美元产值所消耗的能源是日本的 10 倍多，如果日本利用其领先于世界的节能技术帮助中国在今后 20 年内将其能源利用效率提高 5 倍左右，那么其意义不亚于开发出若干个超级大油田，将可能起到缓和日趋紧张的国际能源市场竞争的作用。

进入 21 世纪，世界安全问题正在发生有目共睹的、深刻的结构性变化，即相对于传统安全问题而言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地位日趋上升；相对于人为属性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如恐怖主义、海盗猖獗等）而言，自然属性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如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等）的地位

2003 年日本外相川口顺子在题为《日本外交面临的四个课题》一文中强调“把‘人类安全保障’问题作为外交的重要课题”。详见 [日]《现代》月刊，2003 年 10 月号。

日趋上升。中日在安全领域的共同课题日益增多，重叠利益日益扩大，进行合作的空间和必要性日益拓宽，预计在不远的将来，两国在安全领域的政策取向将从冷战结束以来的“渐行渐远”转向“渐行渐近”。从中日美对待《京都议定书》的不同态度也可看出，虽然所谓“联日抗美”主张太脱离现实，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团结日本制约美国的单边主义倾向既有现实性也有必要性。在中日美三边关系上，中日如果只重视发展对美关系而不重视发展相互关系，对两国都非常不利。日本有识之士也日益认识到日美同盟在应对“21 世纪型安全问题”上的局限性。对有志于做“政治大国”的日本来说，如果政府总是推行那种处处看美国眼色行事、毫无“政治独立”可言的附属国外交，也将会在国内政治中日益失去人心。

第四，中日关系发展与亚洲地区合作的要求已形成相互促进的关系。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对多边外交的态度从消极转向积极，从被动转向主动，令人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中国的以“新安全观+多边外交”为基本特征的“外交新思维”、特别是“对亚新思维”已经转化为具体政策和行动。

“对日新思维”与“对亚新思维”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相互促进的关系，改善中日关系显然有助于亚洲地区合作的发展，推进地区合作的共同事业则有望成为改善中日关系的一个机遇和动力，促使中日关系日渐“融入”地区合作的要求之中。

推进亚洲的地区与多边合作使中日有了一个共同追求的目标和事业，为发展两国关系构筑了一个超越两国关系的平台，有助于加强两国的对话和协调，有助于增强两国共处同一地区的归属感，有助于借助“外力”促进各自国内的改革，从而减少由于各自国内改革滞后所导致的国家间的摩擦。在地区或多边合作中，也可能通过发挥“第三者”的“居间作用”来拉近中日间的距离，比如在中日之间谈不拢、谈不好的问题，在有韩国加入的场合，在有东盟加入的场合，很多问题就变得可以谈，可以办了。

目前，虽然小泉政权仍持有“与中国争夺在亚洲的主导权”的想法，但人们日益认识到“一国主导型”的东亚合作模式是行不通的，中国不会去追求，日本也不宜去追求。越来越多的日本有识之士认为：“日本在亚洲必须与中国和东盟建立合作机制。如果日本与中国在东盟的问题上发生争斗，那么日本将一事无成。我们必须创建一个建立在东盟+中日韩(10+3)框架基础上的亚洲合作组织。”

可以预计，“对日新思维”与“对亚新思维”相互促进，中日关系与亚洲地区合作相互促进，将成为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

请参照《解读中国外交新思维》，载《瞭望》，2004 年第 11 期，第 51-55 页。
此为曾根康弘语，引自 [新加坡]《海峡时报》，2003 年 11 月 14 日。

当前的中日关系就像是一股溪流遇到一块顽石，溪水绕过顽石照样向前奔流。

[收稿日期：2004-03-16]

[修回日期：2004-03-19]

[责任编辑：谭秀英]